

图形-背景关系的可逆性与转喻的认知机制

卢军羽

(景德镇陶瓷学院, 景德镇, 333403)

摘要: 图形和背景关系的可逆性不仅解释了转喻映射的可逆现象, 而且为转喻生成和识解^①的认知机制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框架。转喻的生成和识解是发生在不同时空、认知操作路向相反的两个认知过程, 在研究中将它们混为一谈或偏倚其一都是不足取的。

关键词: 转喻, 图形-背景理论, 可逆性, 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5)11-0024-06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5.11.006

1. 引言

关于转喻的认知过程, 国内外学者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早期转喻的认知研究是在隐喻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的, 因此许多学者(Lakoff & Tuner 1989; Barcelona 2002; Mendoza 2002)认为, 转喻与隐喻类似, 也是从来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现象, 只不过发生在同一个认知域内(本文简称“映射观”)。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转喻认知操作过程与隐喻的不同之处, 提出了新的理论或从新的视角来阐释转喻现象,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转喻是作为认知参照点的来源域概念为目标域概念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如 Langacker 1993, 1999, 2009; Radden & Kövecses 1999; Alac & Coulson 2004; Kövecses 2013)(本文简称“参照点观”);(2)转喻是一个认知域突显(domain highlighting, Croft 2002/1993)或目标域概念突显的认知过程(conceptual prominence of the target, Panther 2005)(本文简称“突显观”)。

与“映射观”相比, “参照点观”和“突显观”进一步揭示了概念转喻的认知本质, 被广泛用于语法、语用推理、语篇分析等领域,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 Panther & Thornburg 2003; Panther 2005; Langacker 2009 等)。但是, 转喻的认知研究目前仍旧面临着许多困境(参见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Rojo 2009: 67), 无论是“参照点观”还是“突显观”都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 例如:(1)根据完形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在知觉场中起认知参照点作用的是背景, 为知觉中相对不突显的部分, 而“参照点观”将高度突显的来源域概念实体视为认知参照

点, 这不免有些令人费解;(2)“参照点观”认为在转喻的认知过程中, 处于高度突显状态的是来源域概念, 而“突显观”认为目标域概念比来源域概念更突显, 为何有此分歧? 本文认为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 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转喻生成和识解认知过程的差异, 或者只关注其一, 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语言的编码和解码是语言学关注的两大基本问题, 对于作为概念过程的转喻来说, 两者为相逆的认知过程, 转喻研究必须对两者作出统一的解释。此外, 与此相关联的“转喻映射可逆性”现象(Radden & Kövecses 1999: 22)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为此, 我们引入了图形-背景关系理论, 从图形-背景的可逆性角度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我们的理据是, 转喻作为人类普遍的认知模式必然受到知觉规律的制约, 图形-背景关系反映了人类知觉组织的基本规律, 因而应用图形-背景关系理论研究转喻有望进一步揭示其认知本质。

2. 图形-背景关系的可逆性

2.1 图形-背景关系可逆性的知觉基础

哥本哈根学派的奠基人鲁宾(Rubin 1958/1915)通过著名的人脸/花瓶幻觉(face/vase illusion)实验指出了图形、背景区分及其可逆性, 即场景中的图形-背景分布格局可以相互转换: 人们既可以用花瓶为背景认知人脸(此时人脸为图形), 也可以用人脸为背景认知花瓶(此时花瓶为图形), 但不能同时认知人脸和花瓶。随后, 完形心理学家在考察视觉场组织框架时充分利用了图形-背景关系及其可逆性。他们发现, 人的知觉场有主次之分, 当人们观察某一情景时, 情景中只有一个部分或区域会在人的知觉中突显而被首先认知, 这一部分被称之为图形, 其余部分成为背景, 充当图形的认知参照点(Ungerer & Schmid 2001: 157); 在背景向图形转换的过程中, 场

作者简介: 卢军羽, 景德镇陶瓷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电子邮箱: jylu515@163.com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英汉事件交替动词的语义聚类特征与句法互动研究”(编号 15YJC740051)的阶段成果。

的一部分变得更加坚实,在图形向背景转换的过程中,场的一部分变得更加松散(Koffka 1999/1935: 177-86)。不过,完形心理学家认为图形-背景的可逆性具有特殊性:就空间布局而言,图形-背景关系可逆性现象多半发生在类似人脸/花瓶等的对称格局中,因为在非对称性的格局中,边界(contour)具有单面性(one-sided),很难出现双面呈现(double representation)的现象(同上:190);就认知主体而言,注意力指向对图形-背景角色的转换起重要作用,图形-背景可逆性实验多半是在实验设计者提示(instructions)的情况下发生的(Vernon 2013:98-102)。

完形心理学家提出的注意力对图形-背景组织及其可逆性的影响受到现代知觉理论的关注,很多学者就注意力和图形-背景组织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Julesz(1984)、Triesman(1986)等认为图形-背景的分离性(figure-ground segmentation)属“前注意力”(preattentive)的知觉现象。还有学者(如 Baylis & Driver 1995; Vecera *et al.* 2004)区分了内生注意(endogenous attention)和外源注意(exogenous attention)^②对图形-背景知觉选择的影响。内生注意选择图形主要基于知觉主体因素(兴趣爱好、社会规约、言语提示等),而外源注意则通过知觉对象特征(如紧凑性、闭合性、运动性等)选择图形。最近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不仅图形特征(figural cues)会吸引知觉主体的注意力(属外源注意)而且知觉主体的注意力(属内生注意)也会主动选择图形(Qiu *et al.* 2007; Huang & Pashler 2009)。“图形特征”属知觉对象特征,具有客观性,在非对称性格局中一般不会引起图形-背景关系逆转;但注意力的人为选择受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动态性和随机性,可以引起一切格局中图形-背景关系的逆转。以上研究表明,在“内生注意”和“外源注意”的共同作用下,图形-背景关系的可逆性就不只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如对称性格局中)才发生的知觉现象,而是知觉的一个普遍规律。

2.2 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关系的可逆性

Talmy(1978)首先注意到了视觉场中图形-背景关系在语言中的实现问题,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如 Fillmore 1985; Langacker 1991; 张克定 2011 等)将图形、背景概念用于认知语言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注意到了或反映了认知主体因素和认知对象特征^③对图形-背景关系及其可逆性的影响。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由认知对象特征引起的外源注意和由认知主体因素引起的内生注意体现为认知突显。认知对象特征引起的认知突显是认知主体感官对认知对象的自然反应,属认知自然突显。关于认知自然突显的规律,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都有过深入的

研究,如“普雷格郎茨原则”(principle of prägnanz)、Langacker(1993)的认知突显选择原则、Radden 和 Kövecses(1999:46-47)的转喻来源域概念知觉选择原则(perceptual selectivity)等。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如注意力的人为选择、兴趣爱好、知识经验、情绪等导致的认知突显是认知主体主观选择的结果,属认知人为突显。如果将认知对象扩大到语言实体,那么导致认知人为突显的因素还有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认知自然突显和认知人为突显都有可能影响人们选择图形,进而影响语言表征。如“上厕所”这一事件包括了很多细节,如:走进厕所、解开衣带、排尿、洗手等,在这些细节中“排尿”是事件的核心细节,若无其他因素干扰,该细节在语言生成时会在认知中自然突显而成为图形,因此小孩在有尿意时通常会直接说“我要撒尿”。但成人一般会说“去洗手间”,这是因为成人的认知受到了社会规约(如礼貌原则)的制约,将更符合交际得体性的次要细节“洗手”人为突显,获得图形地位,从而进入语言表征,形成不同的转喻表达式。

影响人类认知突显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图形-背景逆转提供了可能。Langacker(1991:308)、Talmy(2000:316)等研究表明,图形-背景关系不是情景中给定的,认知对象的客观特征(如紧凑性、移动性、对比性等)只会影响图形选择的自然性和可能性,最终图形-背景关系的确立是认知主体对情景识解的结果,换言之,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决定图形-背景的角色关系,这就为语言中图形-背景的可逆性提供了认知理据。例如,

- (1) a. The bike (F) is near the house (G).
- b. The house (F) is near the bike (G).

在一般情况下,自行车相当于房子来说具有图形的典型特征(如可动、较小、结构相对简单紧凑),所以(1a)较容易接受。但是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说话时在认知主体的百科知识中只有有关自行车的信息,并且他想确定房子的方位,此时表述(1b)就更为合适。

图形-背景关系的逆转可以在不同层面连续、多次发生。“图形和背景之间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重复多次使用,在 A 层面是图形的,在 B 层面就有可能是背景,依次循环,相互交替,直到我们认为可以的状态为止”(刘国辉 2006:24)。Talmy(2000:313)指出,与心理学上将视觉场感知为图形和背景两分格局不同,语言学上通常要处理图形实体、背景实体和背景框架三分格局,这就需要在不同层面、多次利用图形-背景概念。例如:

- (2) The lion (F) chased the gazelle (G/F) through the forest (G). (Talmy 2000:336)

(2a) The lion (F) chased the gazelle (G).

(2b) The lion and the gazelle (F) ran through the forest (G).

例(2)句描述的是有三个概念实体参与的位移事件。这一位移事件包含了两个层面图形-背景逆反的认知活动:在较小的层面(2a)上,“lion”是图形,“gazelle”为背景,在较大的层面(2b)上,“gazelle”和“lion”组成了一个图形复合体,“forest”是背景。这两次认知活动通过“gazelle”从背景到图形的逆反,形成一个连续统,在语言世界里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概念结构。

认知语言学中图形-背景关系由认知对象特征、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语境等多种因素触发、伴随着图形和背景关系逆转的动态认知过程。图形和背景之间认知角色关系的动态性和可逆性揭示了概念转喻中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认知操作机制。

3. 转喻的认知机制

3.1 图形-背景关系的可逆性与转喻的生成和识解

3.1.1 转喻的生成

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从客观世界到语言世界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概念化和语言表征。转喻的生成也不例外。Sperb 和 Wilson(1995)的明示交际理论告诉我们,话语的生成是以交际意图的显现为起始点的,就转喻来说,就是转喻目标义(target meaning)的概念化。在这一阶段,交际意图导致目标域概念在语用者的认知中突显,这时与目标义相关的其他概念、细节都还是客观背景,未进入语用者的认知操作。目标域概念一旦形成(此时如果直接进行语言表征就会生成常规语言^④),语用者就会将注意力转向背景区域,以搜寻合适的概念或细节作为语言表征的概念工具(vehicle,即通常所说的来源域概念),转喻操作进入第二阶段:语言表征。在这一阶段,认知对象特征、认知主体(说写者)的主观因素、情景语境都有可能影响用于语言表征的概念工具的选择。当背景中的某个概念在语用者认知中获得突显,即转喻来源域实现概念化,语言表征随即启动,生成转喻表达。由此可见,转喻语言的生成是在两个层面上经历了图形-背景逆转的连续的认知操作过程。在概念化层面,目标域概念是图形,同一认知域内的其他概念是背景,此时来源域还没有形成。在语言表征层面,用作语言表征的来源域概念获得认知突显,成为图形,目标域概念逆转成背景,起认知参照点的作用。例如:

(3) a. The ham sandwich is at table 7.

b. That Yao Ming/The tall man is at table 7.

c. The jeans is at table 7.

例(3a)中 the ham sandwich 是转喻用法,其生成过程如下:受交际意图(餐馆服务员意欲指称点了 ham sandwich 的顾客)的驱使,目标域概念(点此道菜的顾客)首先在说者认知中突显成为图形,此时与目标域相关的其他概念,如此顾客的脸型、身高、发型、衣着、所点的菜等都是背景,起认知参照点作用。进入语言表征层面后,此顾客相关的所有特征都有可能被选中作为图形,关键是看即刻在影响认知突显的三种因素中哪一个起主导作用。显然,在例(3a)中,语境(餐馆)因素导致了认知突显,即在餐馆的背景下,顾客所点的菜是最重要信息,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服务员除了知道顾客所点的菜外,对他们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当服务员不得不提到某一具体的顾客时,他们点的菜最容易获得认知突显(Dirven 1999:275-76;张辉、孙明智 2005:4)。不过也有可能出现其他情况。试想,如果顾客有非同寻常的外貌特征如像姚明一样的身高,那么认知对象这一特征就有可能获得认知突显成为图形而进入语言表征,即用“姚明”(that Yao Ming)或“大高个”(the tall man)来指称该顾客,如例(3b);此外,服务员(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也有可能左右语言编码形式,如服务员若对服饰特别感兴趣,则有可能利用此顾客的服饰特征(如“the jeans”)来指称该顾客,见例(3c)。

3.1.2 转喻的识解

转喻的识解也经历了两个层面的认知操作和图形-背景一次逆转的认知过程,只不过认知操作路向与生成恰好相反。由上述可知,转喻的生成是从目标域到来源域,从目标义的概念化层面到语言表征层面的认知操作过程,在此期间,目标域概念由图形逆转成背景而来源域概念由背景逆转成图形。在转喻的识解阶段,首先发生的是语言层面^⑤的认知操作。语用者(听读者)受转喻语言表征的刺激,在认知中形成来源域概念,即来源域实现概念化,然后在背景中搜寻目标义,进入目标义概念化认知操作。如果语用者在背景中成功地确定了目标义并将其概念化,则转喻识解认知操作完成。由此可见,转喻识解的关键在于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在认知中的“逆转”,即来源域概念是否能从图形逆转成背景,目标域概念是否能从背景逆转成图形。在转喻识解过程中触发图形和背景逆转的关键因素是上下文语境(包括句子构式)。例如:

(4) a. I often read Yu Qiuyu.

b. I like Yu Qiuyu.

c. I admire Yu Qiuyu. (卢军羽 2011)

在识解例(4a)中 Yu Qiuyu(余秋雨)的转喻义时,经历了图形-背景在不同层面逆转的认知过程。在来源域概念化层面,来源域概念实体 Yu Qiuyu 为

图形,目标域概念实体 Yu Qiuyu's works(余秋雨的作品)为背景;在随后的目标域概念化层面,来源域概念实体 Yu Qiuyu 逆转为背景,目标域概念实体 Yu Qiuyu's works(余秋雨的作品)逆转为图形。图形-背景的逆转和目标义(Yu Qiuyu's works)的成功识解都取决于构式“read+N”(读什么),因为在 Yu Qiuyu 所属的概念域中能读的只能是 Yu Qiuyu's works,不可能是余秋雨本人或其他所属物。如果换成其他构式,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4b)中进入“like+N”构式的可能是余秋雨本人也可能是其所属物,在缺乏足够语境输入时会引起歧义;而(4c)中的 admire(敬仰)则取消了 Yu Qiuyu 的转喻义,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只可能敬仰余秋雨其人(卢军羽 2011)。

3.1.3 常规化程度与转喻的生成和识解

Radden 和 Kövecses(1999:22)认为转喻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之间的认知联系是建立在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or idealized relationships)基础之上的。张辉和孙明智(2005:5)指出,常规化程度高的转喻和常规化程度低的转喻在认知运作机制上有所不同,我们对此表示认同。常规化程度决定着转喻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的认知距离以及转喻生成和识解所需的认知操作时间。常规化程度越高,转喻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心理距离越短,转喻生

成和识解时的认知操作时间也就越短;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常规化程度高的转喻,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由常规关系连接,它们在转喻生成和识解的不同阶段在图形和背景之间转换更自如,甚至像常规语言一样无需经历从目标域到来源域(生成时)或来源域到目标域(识解时)的图形-背景逆转过程,直接在语言表征层面进行转喻生成和识解的认知操作,这就好像当我们面对已经看过无数次的全家福,我们无需一个个辨认就能迅速指出照片中任一个家庭成员一样。例如,“中国大败印度”,由国家指代这个国家的(蓝/足/排等)球队是一个常规化很高的转喻,语用者在指称目标义(中国队/印度队)时不需要选择来源域概念(vehicle)的认知过程,目标域概念(中国/印度)在语用者认知中直接获得图形地位进入语言表征;在识解这个转喻时,我们一般也无需将语言表征层面上处于背景角色的目标域概念(中国队/印度队)逆转成概念化层面的图形,因为在识解认知操作中,处于语言表征中的来源域概念“中国/印度”可以直接连接到或者说代替目标域概念“中国队/印度队”(由于两者之间具有常规关系)。

3.1.4 转喻生成和识解的统一解释

至此,我们可以用图形-背景理论对转喻的生成和识解认知过程作出统一的解释(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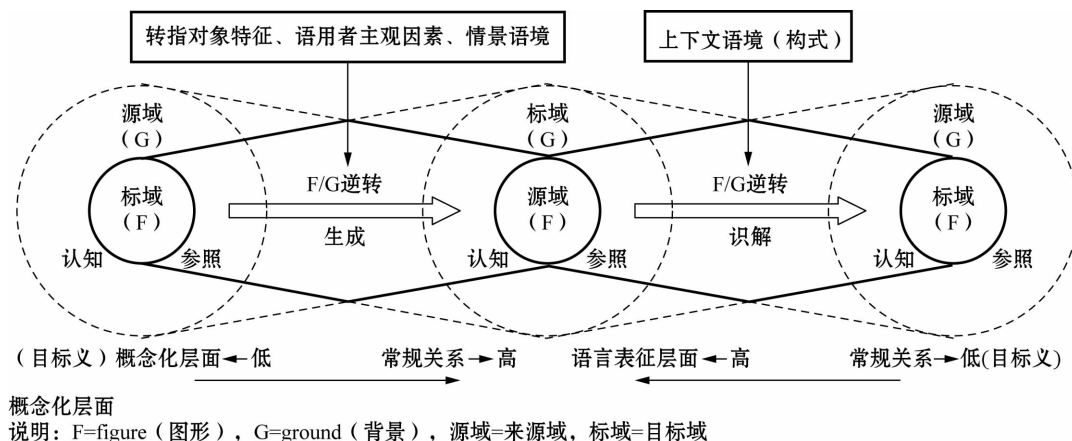


图1 图形-背景理论关照下的转喻生成和识解认知过程示意图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转喻的生成和识解并不连接在一起,因为它们一般不发生在同一时空,这里把它们放在一起,只是为了加强两者之间对比的直观性和节省篇幅。如图1所示,转喻的生成和识解是两个路向相反的认知过程,它们都经历了两个层面、图形-背景一次逆转的认知操作。转喻的生成是从目标域到来源域,从目标义的概念化层面到语言表征层面的认知操作过程,在此期间,目标域概念由图形逆转成背景而来源域概念由背景逆转成图形。转喻生成过程中,触发图形-背景逆转的因素有认知对象特征、认知主体(说写者)

的主观因素和情景语境。与之相反,转喻的识解是从来源域到目标域,从语言表征层面到目标义的概念化层面的认知操作过程,在此期间,来源域概念由图形逆转成背景而目标域概念由背景逆转成图形,触发图形-背景逆转的主要因素是上下文语境(句子构式)。在转喻生成和识解过程中,图形和背景的分离只是瞬间状态,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相互连接、相互渗透,形成一个连续统(图1中用连线交错并且虚实变化标识)。在转喻生成的过程中,语用者一旦获得目标义概念,就会将注意力迅速转向背景并搜寻来源域概念工具,在此过程中,目标义由概

念化层面的图形逐渐隐没在语言表征层面的背景里(如图1中两个层面的目标域连线由实到虚所示),而来源域概念逐渐从概念化层面的背景中显现为语言表征层面的图形(如图1中两个层面的来源域连线由虚到实所示);转喻识解过程认知操作模式相同但路向相反。

图1下方箭头表示常规关系对转喻生成和识解的认知过程的影响,即常规化程度越高,转喻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心理距离越短,转喻生成和识解时的认知操作时间也就越短,直至转喻生成时或转喻识解时的目标义概念化层面分别与语言表征层面重叠(图1中用箭头从两端的概念层面趋向中间的语言表征层面来表示)。

3.2 图形-背景关系的可逆性与转喻映射的可逆性

与隐喻认知域映射单向性不同,转喻的来源域和目标域原则上是可以互换的,Radden 和 Kövecses (1999:22)称之为转喻映射的可逆性。例如:

- (5) a. *He hit me on the head.*
 b. *I am happy to see a lot of new faces here.*
 (6) a. *John is a Picasso.*
 b. *He is a failure.*

例5(a、b)和6(a、b)的斜体部分分别代表着PART-WHOLE和ABSTRACT-CONCRETE两个类型转喻,但各组中a、b两句分属逆向替代的两个次类:5(a)为WHOLE FOR PART而5(b)为PART FOR WHOLE;6(a)为CONCRETE FOR ABSTRACT而6(b)为ABSTRACT FOR CONCRETE。针对转喻来源域和目的域可逆性现象,已有的研究(如Langacker 1993;Radden & Kövecses 1999:46-47)大多数只是对其进行分类或描述,没有从认知动因上进行解释。图形-背景理论框架有望弥补这一不足。

由前述可知,图形-背景的可逆性是一个普遍的认知现象,认知对象特征、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和语境都可以影响人们对图形的选择。语用者在选择转喻来源域概念时不仅受到概念对象特征的影响,而且受到概念主体主观因素以及语境(情景语境)的影响。面对同一个事物、场境或事件,不同的认知主体、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在不同的时刻可能采取不同的概念化策略,或用整体代替部分(5a),或用部分代替整体(5b),或用具体代替抽象(6a),或用抽象代替具体(6b)等,实现了同一层面图形-背景的逆转,形成具有逆转关系的转喻表达。因此,Koch(1999:151)认为,一个词汇所表达的概念表现为图形而在同一框架内具有相邻关系的另一概念为背景的状态只是暂时的,说不定在某个时刻某些语用的、概念的或情感的因素会突显同一词汇相关联的背景概念,从而使图形-背景关系发生逆转,这

就是转喻现象。

4. 结语

Koch(1999,2001)曾经指出,转喻是图形-背景效应或是基于图形-背景效应的,可惜他没有加以系统地阐发,这一观点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我们的研究表明,图形-背景理论对转喻的认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图形和背景关系的可逆性不仅解释了转喻认知域的可逆性现象,而且为转喻生成和识解的认知机制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框架。转喻的生成和识解是发生在不同时空、认知操作路向相反的两个认知过程,在研究中将它们混为一谈或偏倚其一都是不足取的。转喻的来源域概念和目标域概念在转喻认知操作的不同阶段交替扮演着获得认知突显的图形角色和起认知参照点作用的背景角色。“突显观”重点关注转喻识解时意义的构建过程(即目标义概念化层面),因而强调目标域的突显性;“参照点观”将处于不同阶段的来源域概念实体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特征(高度突显和起认知参照点作用)置于同一平面上讨论,因而容易引起误解。

近年来,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加工过程的差异越来越受到心理语言学家和功能语言学家的关注,如Boersma(2007)通过语言实验证明了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是两套独立的语法系统,van Valin(2005)在角色-指称语法(Role-reference Grammar)的框架下为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建立了各自的模型。从认知的角度而言,语言的生成和理解是两个逆向的映射过程(前者为“从概念到语言”,后者为“从语言到概念”),两者必然存在差异,但认知语言学界对此还缺少必要的思考,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附注

- ① 本文中的“识解”大致相当于“理解”,但由于本文重点关注语用者理解转喻时的认知过程,故用识解一词代替理解。
- ② 内生注意指认知主体自我控制下的注意,这种注意不是自发的,而是在外界诱导下(如实验指令)知觉主体对注意力指向主动选择的结果。外源注意是人的知觉(包括视觉、听觉等)受知觉对象的吸引而自动产生的注意(automatic attraction of attention),如人的注意力会自动聚焦于黑暗环境中突然出现的亮光。
- ③ 心理学主要是在知觉(主要是视觉)领域探讨图形、背景关系,但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在认知的层面探讨图形、背景概念,所以2.1节中的有关知觉的概念在本节中替换成认知概念,如“知觉主体”→“认知主体”等。
- ④ 此处常规语言是指非转喻(隐喻)性语言,相当于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一致式”。
- ⑤ 此处“语言层面”指语言表征的认知操作层面。

参考文献

- Alac, M. & S. Coulson. 2004. The man, the key, or the car: Who or what is parked out back? [J]. *Cognitive Science*

- Online (12): 21-34.
- Barcelona, A. 2002. Clarifying and applying the notion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update [A]. In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7-78.
- Boersma, P. 2007. Some listener-oriented accounts of haspiré in French [J]. *Lingua* 117: 1989-2054.
- Baylis, G. C. & J. Driver. 1995. One-sided edge assignment in vision: Figure-ground segmentation and attention to object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140-46.
- Croft, W. 2002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A]. In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61-205.
- Dirven, R. 1999. Conversion as a conceptual metonymy of event schemata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75-76.
- Fillmore, C.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 di Semantica* (6): 222-54.
- Huang Liqiang & H. Pashler. 2009. Reversing the attention effect in figure-ground perception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99-1201.
- Julesz, B. Textons. 1984. The elements of texture percep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s [J]. *Nature* 290: 91-97.
- Koch, P. 1999. Frame and contiguity: On the cognitive base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39-68.
- Koch, P. 2001. Metonymy: Unity in diversity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 (2): 201-44.
- Koffka, K. 1999[1935]. *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övecses Z. 2013. The metaphor-metonymy relationship: Correlation metaphors are based on metonymy [J]. *Metaphor and Symbol* (2): 75-88.
-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38.
- Langacker, R.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NewYork: Moul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2009. Metonymic grammar [A]. In K-U. Panther, L. Thornburg & A. Barcelona (eds.),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Grammar*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6-71.
- Mendoza, R. F. J. & Olga I. Díez Velasco. 2002. Patterns of conceptual interaction [A]. In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489-532.
- Panther, K-U. 2005. 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A]. In R. F. J. Mendoza & M. S. P. Cerve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53-86.
- Panther, K-U. & L. Thornburg. 2003. Metonymies as natural inference and activation schemas [A]. In K-U. Panther & L. Thornburg (eds.),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27-48.
- Peirsman, Y. & D. Geeraerts. 2006.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269-316.
- Qiu T Fangtu, T. Sugihara & R. von der Heydt. 2007. Figure-Ground mechanisms provide structure for selective attention [J]. *Nature Neuroscience* (10):1492-99.
- Radden, G. & Z. Kövecses.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7-60.
- Rojo, A. M. 2009.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of metonymy-based humor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0): 63-83.
- Rubin, E. 1958[1915]. Figure and ground [A]. In D. C. Beardslee & M. Wertheimer (eds.), *Readings in Perception* [C].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4-203.
- Sperb, D. &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 Treisman, A. 1986. Features and objects in visual processing [J]. *Scientific American* 255:114-25.
- Talmy, L. 1978.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A]. In J.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in Human Language Vol. 4* [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27-49.
- Talmy, L. 2000. *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Cambridge: MIT Press.
- Ungerer, F. & H. J. Schmid.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van Valin, R. D. 2005. *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ecera, S. et al. 2004. Exogenous spatial attention influences figure-ground assignment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20-26.
- Vernon, M. D. 2013. *Visual Percep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刘国辉. 2006. 图形-背景空间概念及其在语言中的隐喻性表征[J]. *外语研究*(2):23-29.
- 卢军羽. 2011. 隐喻与转喻:争议与原型解释[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8-15.
- 张辉、孙明智. 2005. 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3):1-6.
- 张克定. 2011. 英语倒装方位构式的认知语篇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4):529-39.

(责任编辑 甄凤超)